

第六章

到红五军团工作

走马上任

去一支新起义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我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大。作为政治委员，首要的任务是统一党内同志的思想，明确工作方针，以便组织起坚强的领导核心。记得去红五军团之前，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集我们开会，在一起交流了思想。当时，大多数同志愿意去工作，因宁都暴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对革命是一件大好事，去工作是光荣的。但对于究竟怎样去改造这支部队，一些同志心中无数，有畏难情绪。当时从上至下有人怀疑宁都暴动靠不住，说他们可能是来苏区过渡一下，再去广东投靠陈济棠。因此，少数同志顾虑重重，不愿去工作。王稼祥代表军委向我们作工作指示时，说明了这支部队起义和我们去工作的意义。总的精神是要将部队团结教育改造成一支新型的军队，壮大红军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对起义部队给予更为具体的指

示。他对我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在这些指示的鼓舞下，我们这批干部初步明确了工作方针和做这项工作的意义，统一了思想，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

我到红五军团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刘伯坚。伯坚和我可以说是老同学了，他出身在四川平昌县一个贫农的家庭，一九二〇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底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正好我也在“东大”，便认识了伯坚。大革命时期，伯坚受党的委派，和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主持政治工作。他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他才华出众，又很谦虚谨慎，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还得到一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慕，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他也十分爱戴。他在西北军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伯坚再次去苏联，我仍与他同学，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一九三〇年我们先后回国，我到中央苏区后，与他重逢。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与伯坚的影响和具体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

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二十六路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都认识刘伯坚。他在五军团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暴动以前，他积极做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与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此后便在这支新生的部队中工作。按道理讲，伯坚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委员的人选。后来，由于富春的推荐，军委决定我担任红五军团的政委，我比伯坚同志晚到部队几天。刚到五军团的时候，情况不熟悉，伯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向我介绍了这支都队的历史，起义的经过，并逐一介绍参加领导起义的高级将领——当时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等人的情况以及部队的现状。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如何在部队开展工作的方法、步骤。一致认为，要从团结入手，特别要团结好起义的高级将领，寓改造于教育之中。伯坚还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把我介绍给大家。在共事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互相配合默契，我深感伯坚是一个党性很强、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很高、有非凡组织才能的好同志。他多才多艺，会做诗，文章写得漂亮，还擅长书法。他为新生的五军团起草了许多宣言、支告，很有宣传鼓动性。他才高而不骄矜，尊重领导，礼贤下士，善于团结同志。起义之初，一些军官的思想不稳定，伯坚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谈话，哪里出了问题，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宣

传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在五军团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在部队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打仗期间，伯坚率领政治部鼓动部队士气，宣传组织群众。虽然战争那样残酷，红五军团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这些都与伯坚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后来，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听说伯坚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有能随红五军团长征，留在赣南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幸被捕。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牺牲了。

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初到红五军团，困难重重，问题成堆。我和伯坚用了几天的时间，走遍了驻在九堡、沿坝、石城的三个军的每一个师、团，和大部分起义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做了些调查研究。这次起义是在少数上层军官中秘密策动的，大多数人在开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去做什么，直至宣布起义，方如梦初醒，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思想波动最厉害的是军官。在军官中自觉起义当红军的，主要是赵博生、董报堂、季振同等暴动的组织者以及受党影响较深，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官，这部分人数量不大。思想比较反动，认为来当红军是受骗上当，没有什么出路，坚决要求走的人，数量也不大。大多数人是在等待观望，不置可否，思想问题也

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起义当红军已成事实，不得不干；有的怕从此回不了家，担心家里受株连。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主流较好。他们大多数出身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家庭，是被迫来到江西与红军作战的。在江西的这些日子里，他们受到了“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士兵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的宣传，特别是被俘的官兵，亲眼看到了苏区和红军的情况，释放回去以后做了义务宣传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堪忍受蒋介石的歧视和军阀主义的压迫，愿意当红军。当然，在旧军队中，他们受旧思想影响也很深，帮派义气、乡土观念等，有些看着上级军官的眼色行事，所以下级官兵中也有要求走的。就是那些愿意当红军的进步官兵，此时也是惶惶惑惑，不知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记得刚到红五军团的时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同志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希望借助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的力量把部队引上红军的道路。同时，又由于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一套制度、传统缺乏了解，处处谨小慎微，唯恐做错事。起义官兵也是用千万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等待着我们政治工作的开展。

按照军委的指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团结、教育、改造作为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首先做安顿起义部队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政工干部日夜在部队中找各级官兵谈话，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鼓励他们安心在部队

工作。聂荣臻同志就是在这期间，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派，来五军团帮助、指导工作的。在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从中发现思想进步的同志，进行教育培养，加强骨干队伍，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团结进步的，带动中间的，影响落后的。对不愿留在部队的人员，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还从他们中抽调了一部分官兵到红军学校去学习。随着各级政治委员陆续配齐，我们又从红军和红军学校中调出部分干部配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党员，形成了我们的政治工作网。通过党员联系群众，做起义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我们特别强调各级政工干部，除了做好所属干部和部队的工作外，特别要注意做好同级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记得开始的时候，伯坚对我说，起义过来的军官们顾虑自己不懂红军的规矩，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不会讲话，不知怎样带兵。我说，没关系，我们办训练班，把这些事情一课一课地讲清楚。这样，军团组织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等等。也讲马克思、列宁，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觉悟，学习做红军的指挥员。还有一次，伯坚告诉我说，下边一些军官要求政治委

员给上课哟。他们说，老讲打倒帝国主义，可是不知什么叫帝国主义。我说，好吧，就专讲一讲帝国主义。我就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讲到它的垄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其必定要灭亡的理论，大家反映听得明白、解渴。

我们特别注意团结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是在起义后不久入党的。这两位同志表现一直很好，虚心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积极配合我们做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在这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做了他们很多的工作，多次找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去个别谈话，对他们弃暗投明，参加革命给以高度的评价，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放下思想包袱。记得季振同从临时中央谈话回朱后，情绪非常高昂。他对毛泽东和蔼谦虚，平等待人的态度，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赞叹不已。对朱德的宽厚诚朴和周恩来的谦和精明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对我说，红军里面有人才，红军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革命关系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到了革命的军队，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受教育。

为了使起义官兵加深对红军的了解，亲身体验红军与白军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组织起义官兵轮流到党政机关、红军学校以及部队驻地去参观学习，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红

军是如何生活、工作、学习的。参观期间，中央临时政府、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亲自参加接待，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这使起义官兵十分感动，深深体会到红军中确实是“官兵夫一律平等”。苏区还为起义部队专门组织欢迎大会，召开各种代表会议时都邀请五军团参加，请季振同讲话，造成一个促使他们革命的环境。从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报道当时苏区军民欢迎红五军团的情景。这说明，当时我们党为了争取这支部队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花了心血的。

我们刚到部队的时候，起义官兵中患病的很多。打摆子的、拉痢疾的、生疮烂腿的都不少。他们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大米饭都做不好。加上北方人到江西，语言不通，出外采买副食品部有困难，伙食搞得很差，一到吃饭时就有人唉声叹气，牢骚满腹，想回北方去。关心和改善部队的生活，成了稳定思想的重要一环。我向军委接告了这个问题，军委非常重视，马上从红军各都队中抽调了一部分本地籍、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和炊事员，充实到五军团帮助改善生活。对部队中的伤病员，则分别送到红军医院或老乡家去养伤治病，派人经常去慰问他们。当时红军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党对红五军团尽力给予照顾，组织地方群众带看菜肉蛋禽来部队慰问，想方设法搞些面粉给他们改善生活。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记得季

振同特别爱吃面，尤其爱吃馅饼，我们对他照顾些，多拨给他一点面粉。每到他吃馅饼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来叫我：“政治委员，来，我请客。”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民主政造，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现在说来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在当时，却是相当艰巨、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触及了旧军队封建军阀制度的根本。冯玉祥的部队一向以治军严面闻名。这种“严”，不是靠政治工作，靠觉悟，而是靠惩罚。部队中军阀主义严重，官兵不平等，军官打士兵是常事，而且上级可以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同时，军官剥削士兵，扣兵饷，吃空额。要使部队真正成为红军，必须破除旧的一套，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我们按照红军的传统，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自己研究决定自己的事情。在部队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干部。各连队还建立了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军官随意扣兵饷的现象被禁止，大家发一样的伙食尾子。这些做法在士兵中引起极大反响。我们还在士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从“回忆对比红军与白军有哪些不同”这样浅显的道理入手，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军官中，对这种民主政造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他们怀疑，不打不骂，单靠做政治工作就能带好兵？当

政治工作开展起来以后，他们发现士兵们奇迹般地听话了，便认为红军的这个办法的确很灵。我们抓住时机对军官进行教育。这样，政治教育和士兵影响互促互进，使教育改造工作不断深入。当时，蒋介石、孙连仲等对二十六路军起义是如梗在喉，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策反宣传，还多次派飞机散发传单，绝大多数官兵毫不为之所动。一九三二年初，在红五军团答复敌人的策反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夫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专替某一人打仗，还要受很利（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贫苦工农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了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分了田地，都有衣穿，有饭吃，与充满了饥荒灾祸杀戮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的无限忠实，吃苦，耐劳和勇敢，与借军阀赚钱做官的国民党员完全不同；我们又看见了苏维埃中政府 and 各地苏维埃的负责人员都是（为）工农办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各县政府的主席委员都是军阀官僚政府，只知剥削压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点好事，完全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们感觉得当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得出路……”这段文字是很能反映红五军团绝大多数起义官兵的心声的。

当然，这种教育、改造部队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旧军队的习气和制度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对这种根本改造部队的做法很不习惯。如官兵平等、不准打骂、不许扣兵饷等等，有些军官想不通。另一方面，部队在改造过程中也受到一些“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部队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份，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部队还有发动士兵控诉军官的事情。加上国民党通过各种渠道的反宣传，对起义不久尚未稳定的部队也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部队开始发生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一月下旬，十四军工兵连的八十多人反水。有些军官提出辞职，要求离开部队，有些干脆不辞面别。还有极少数的人喊一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口号。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一支刚刚起义的部队来说，是不奇怪的。我们除了对确属反动的少数人进行严肃处理外，对大多数人主要还是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晓以大义。但是在我们党内，当时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起义部队发生的这些问题看的较重，甚至还有武力缴械的主张。这些“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更加剧了这支部队的思想混乱。当时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分头在三个军中做工作。三个军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十五军，刘伯坚日夜在那里做思想工作。军委也专门把季振同、黄中岳找去谈话，个别给他们做工作。这对，十五军中谣言四起。如说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四军来缴十五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非常紧张。

伯坚发电报来，反映了十五军的问题，我与季振同赶回九堡，那正是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军官到军团都坚决要求离开部队。为了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我与季振同研究决定，召集了九堡会议。那时我们军团部和十五军军部都在九堡。参加会议的除了我和季振同以外，还有黄中岳、左权、高自立、苏进等同志。当时我们在里屋开会，外屋里那些要求走的军官打着背包坐在地上等着。季振同对此束手无策。会上，我反复说明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党。这时，有的人便提出“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彻底清洗”等几种说法如何解释，季振同也向我提出质问。会上同时提出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对要求走的军官怎么办？我看会议实在无法开下去，便宣布休会。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我马上到中央去请示。走出屋来，即备马上鞍，从九堡到瑞金三十里路，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赶到。先见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见了中央局及军委领导。我向他们报告了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的难题。当时，有些领导同志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我是很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便说，先不要采取这个办法，待做些工作看看再说……

从军委出来，我又去找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座两层的小楼上，下边是放东西的仓库。有个两只脚的梯子，从梯子爬上去便是毛主席简单的办公室兼卧室。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摆些书刊、文件，一两个凳子，还有一张床。毛主席见我来了，起身迎楼，招呼我坐下。我即向毛主席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的领导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问毛主席怎样办？毛主席听后沉思了片刻，反问我：“你的意见呢？”我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毛主席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毛主席对我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我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心里豁然开朗，当天就快马加鞭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我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季振同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好！拥护！赞成！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部队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季振同这样一说，其他同志的情绪也都转变了，很快统一了思想。季振同走到门口，对等在外边的那些军官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他还拿出了自己的一些光洋和白区的票子，分给了那些要

求走的人做路费。就这样，一场风浪总算平息了。我们这些在毛主席教育下走过几十年革命道路的同志，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决策和指导，如果按教条主义的办法去做，红五军团在整编和改造中可能遇到更大的困难甚至挫折。其实，你越是相信他们，工作越好做。大部分起义官兵都表示愿意留下革命，一些起义官兵离开部队后，找不到出路，有些人又自动回来了，我们仍旧一视同仁。我们反复教育党内的同志，思想工作要循序渐进，要允许思想上有反复。

在宁都起义和教育改造部队期间，赵博生、董振堂起了非常好的表率 and 推动作用。赵、董都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们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教民大志。在旧军队的十几年，他们陷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恼之中。大革命时期，他们曾亲身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有深刻的印象；到苏区以后又耳闻目睹，深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教国教民的党。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毅然改弦更张——领导起义，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起义后，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博生同志有学识、有胆略，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对部下，总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从不以势压人。生活上朴素廉洁，没

有旧军人那种恶习。具有这样品质的高级将领，在旧军队中是少见的。起义后，他一再向我表示自己没有受到党的组织训练，希望党多多给予帮助、指导。每每与他商谈工作，他都非常谦虚。一旦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他总是坚决地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很强的组织纪律性。董振堂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在旧军队，他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式的军人，为人刚正，不苟言笑。对旧军队的练兵方法，他有很深的造诣。他带兵既严格又爱护，赏罚严明，又能以身作则，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擒拿格斗，善于近战、肉搏战，有相当的战斗能力。起义后不久，他入了党，曾向我表示，从此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有一些储蓄，也执意要拿出来献给党。他做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特别认真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经常与我一起商讨军事问题，非常虚心。这两位同志在红五军团中是很有影响的。在教育改造部队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派去的干部合作得很好。就个人来说，我深受感动，我也是以他们为师的。在部队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以老上级对部属的身份，配合政治委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例如，在整编过程中，需要打破建制实行混编，这对子讲究帮派义气的旧军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军官以相随多年为由不愿离开他们左右。博生、振堂同志努力说服这些部下，顾全大局，克服私人感情，服从组织的决定。所以，在他们兼任军长的十三、十四军中，虽然有些波动，但由

于军政首长拧成一股绳，问题解决的都比较顺利。在后来的赣州、水口战役中，他们都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指挥若定。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生同志英勇牺牲于第四次反“围剿”的黄狮渡战役；振堂同志则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最后西路军渡黄河以后，在高台战役中英勇牺牲。这两位同志从一个有着爱国正义感的旧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很值得颂扬的。对于他们，我至今仍很怀念。

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着重训练部队山地运动战、游击战。因为这支部队过去活动在大都是平原地区的北方，主要打法是阵地防御战，讲究擒拿格斗，最有名的是大刀砍杀。而苏区处处是高山峻岭，必须学会红军的打法。我们还组织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按照红军的生活制度要求部队，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规。在此基础上，为了打破旧军队的小团体主义，很振军委二月二日训令，从二月中旬开始，红五军团打破建制在全军团进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的较细，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混编任务，愉快地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少数愿意离队的官兵，就发足路费送行。还有一部分军官调红军学校去学习、任教。我们从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表现好的同志，并发展他们入了党，逐步改变部队上层

领导的成份。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红五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制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稼祥等领导同志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当时党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在改造部队的具体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在以后对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处理问题上，都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在工作中也不能不受到一些“左”的影响。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是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特别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的指示去做了，对大规模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红五军团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以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就是很好的证明。

关于季振同

在红五军团的创立与改造过程中，对季振同的工作是举足轻重的。而季振同后来被错判以至错杀，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作为当时的政治委员，我感到有必要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时年三十岁。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在部队里有一个警卫班，七、八个人专门为他服务。季振同过去是冯玉祥手枪旅旅

长，改编成二十六路军后为七十四旅旅长，这个旅实力雄厚，装备精良，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由于季振同率七十四旅参加宁都起义，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季振同是有很伟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我刚到五军团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我，一方面又有戒心，工作胆小、谨慎，生怕我们抓他的小辫子。大革命时期我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党代表，对国民党将领的特点有所了解。针对季振同的思想，我很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虚心向他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将革命的道理由浅入深地讲给他听。季振同学习也是很虚心的。从思想感情上，我也尽量与他接近，我曾有意与他谈些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他一起找革命的共同点，使他消除顾虑，向往革命，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季振同为人比较活跃、开朗，爱好文艺，喜欢跳舞、演戏。我们就经常邀他参加部队的文娱活动。有一次，我和季振同同台演过一个戏，季振同演一个军阀，我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我们都演得很认真、很风趣，部队看得十分开心。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喊我“帝国主义”，我喊他“军阀”，十分和睦融洽，彼此是信任和互助的。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季振同，不能用当时红军领导人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与赵博生、董振堂相比较，思想基础也不同。他身上

旧军人的习气更浓厚一些，思想改造的任务更艰巨一些，我们对他做的工作也需要更多一些。就我与他的接触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好的，有些问题都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与他谈话以后，经常流露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崇高敬意。当时敌人对季振同的策反工作很厉害，派人、写信等等。有些事情季振同也是与我讲过的。如冯玉祥派高参来与他联系，季振同告诉了我，我也报告了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与其见面。敌人的一些策反信他也送给我看过。当然，是否敌人的策反活动他都报告了，也很难说。我认为，敌人的这些策反活动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阻止敌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争取季振同革命，粉碎敌人的阴谋。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的秘密反水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报同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对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研究。就季振同本人的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旧军人的思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格的。然而，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其要求进步的表现。从有利于部队的整编，有利于稳定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这个大局考虑，有必要吸收他入党。于是，我们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不久，军委批准他为特殊党员，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做的介绍人。

赣州战役后，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去苏联学习的要求。那时候，人们对苏联是非常崇拜的，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能去学习是十分光

荣的事情。对此，我曾和他推心置腹的交谈过，诚恳地挽留他。但季振同不愿改变初衷。他对我说，自己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他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苦，而且还带着旧军阀的帽子，希望能去苏联学习军事。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季振同从起义过来到赣州战役的这段时期，总的态度是明朗的，是积极配合我们进行改编工作的，赣州战役表现也是好的，并没有发现他有后悔、企图反叛之意。我分析他要求离开红军的原因，感到缺乏红军的军事指挥能力、惧怕红军的艰苦生活的思想是真实的。同时，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放心，有顾虑，还背着一定的思想包袱。反叛回去，自知不会有好结果，提出去苏联学习是唯一比较好的出路。学习后就脱胎换骨了，名声好，回来参加革命才有前途。尽管季振同要求去苏联学习有他的一些个人想法，但是，作为一个旧军人，他的基本思想还是积极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于是，我发电报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学习的要求。季振同还要求给他一点金子做路费，中央也同意了。季振同走的时候，我在五军团组织召开了欢送会。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留给了我，一匹很好的青鬃马也留下了，后来我送给朱总司令骑了。枪也交了，他的警卫班

（警卫班长就是后来曾任过空军副司令员的王秉璋）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我派人将他送到中央去了。季振同走后，红五军团由董振堂接任总指挥。

漳州战役结束，五月份，发生了所谓的季、黄谋叛事件。先是在漳州将十五军军长黄中岳逮捕，后又将等待出国的季振同逮捕。由于这时季振同已离开了部队，黄中岳率十五军划归一军团，亦不在我们部队，所以我对其被捕判罪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我虽有疑虑，但在传达这一事件时，为了稳定部队，还是振力按照中央的口径去教育部队。以后前方战事紧张，也没有过问此事。后来听说季、黄二人被公审，原定死刑，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改为十年徒刑。可是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下，将他们二人处决了。几十年来，对此案我始终有些想法。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左”的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这使我感到欣慰。

参加赣州、漳州、水口诸战役

当红五军团还在进行整编的时候，赣州战役已经打响了。打赣州，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毛主席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但教条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调三军团等主力打赣州，企图通过攻打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一省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

赣州战役是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进行的，三军团的指战员们打得很英勇。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是坚固的城墙，强攻不易，我三军团便进行坑道作业，从地下接近敌人的城墙进行爆破。敌人火力太猛，连续几次爆破都未成功，自己伤亡很大。由于前方战事紧张，军委指示我们红五军团迅速完成整编，准备开赴前线参战。二月中旬五军团完成了整编，即电告军委。新整编的部队情绪稳定，我们一面集结待命，一面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部队参战热情很高。二月中旬，按照军委指示，五军团十三、十四、十五军向赣州疾进，驻茅店、江口一带，准备增援三军团。此时赣州战役已打了二十多天，敌人据险固守，始终未能打下。二十七日，我们接到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来函，得知敌罗卓英师及陈诚、公秉藩部自吉安方向未援。于是我们立即请示军委，建议在谭口、储潭、大湘一线沿河阻击敌人，以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此部署得到军委的批准。

我十五军进至储潭、大湖口一线，其余部队进至里镇、梅林（今赣县）一带，在赣州外围阻击增援敌人。我攻城部队经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伤亡大而且困乏。城内敌人自恃有援兵，进行出击，一下把我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了起来，情况十分危急。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惶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记得前几年，一位当年曾在这个师任师职干部的同志来看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说，那次若不是红五军团，我们师就全完了。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参加的第一个战斗。

赣州久攻不克，前后历时一月余，最后不得不于三月七日撤围。这一仗没有打胜，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政治上提出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象赣州那样敌人重点防御的城市，硬要去打，结果打成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赣州撤围后，部队集结于江口。三月十二日，军委发布命令，重编一、三、五军团。原五军团十五军调给一军团；十四军调给三军团；十三军和原属一军团的三军组成五军团。季振同仍任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十三军仍由董振堂兼军长，政委何长工；三军军长徐彦刚，政委葛耀山。记得在江口集结混编完成后，一、三、五军团开了联欢会。会上，

不知是哪位同志“起哄”，说我会跳舞，在一片拉拉声中，我被硬拉上舞台。于是，我穿上一双高筒皮靴，不无幽默地对大家说，我来一个高加索舞。其实，我也并不会什么“高加索舞”，就是学着苏联人的样子，在舞台上乱蹦乱跳了一气，不料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舞”毕掌声欢声雷动。从此得了个“会跳舞”的名声。

赣州战役以后，红军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央召开了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向北发展的主张，即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赣东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逐渐与赣东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在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毛主席的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仍决定主力分兵两路，由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委任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总政委；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总政委。沿赣江而下，占领沿江大城市，赤化两岸地区，执行完成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分兵后，五军团为第二梯队，监视广东粤军，掩护三军团过江，处理一军团行动后的善后工作。这样，五军团的三军，十三军即活动于赣州以南，信丰与安远之间，把守苏区南大门，同时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打土豪，筹款子。那时红军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巩固的后方，单靠苏区人民节衣缩食的供给是不够的。所以，红军除了打仗取得一些装备上的补充以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筹款筹粮，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时，毛主席提出建议，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经军委

批准，一军团先行东下，打下龙岩后，又准备攻打漳州。漳州是福建的一个大城市，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为了打胜这一仗，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开往龙岩。四月中旬，五军团到达龙岩。三军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配属一军团参加攻打漳州，军团总直属队驻龙岩城，十三军分别驻适中、夏老、大小池，主要任务是维护龙岩至龙山、汀州至上杭的交通线，保证漳州战役顺利进行。此时龙岩刚刚打下不久，尚属新区，情况较复杂。土豪劣绅多逃进土围子，群众受欺骗宣传，不少人躲进山里，城里粮米很贵。周围山里土匪也很多。部队一方面执行总部交给的任务，一方面打土围子，消灭土匪，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恢复苏区。同时整顿部队。这里我还记起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初到新区，我们对部队要求很严，规定不准无故放枪，违者坐禁闭。有一天，董振堂同志在擦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这时下边有些士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讲开枪要坐禁闭吗？这下总指挥开枪了坐不坐禁闭呀。”这些议论传到董振堂耳朵里，于是他打起背包要去坐禁闭。我听到此事连忙去劝阻他。我说你这是无意中走的火，与我们禁止放枪是两回事，不要去坐禁闭了。但董振堂执意要执行纪律，我再三劝阻还是不行。最后我急了，说，如果你一定去坐禁闭，那我也陪你一起去坐。这样他才罢休。这件事传开了，部队很受教育，总指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纪律，下级官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红五军团之所以能迅速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红军部队，与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自觉革命，自觉改造的表率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漳州战役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张贞的主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到一大笔款子和物质，补充了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大胆的外线出击，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震憾了敌人的营垒。

漳州战役后，部队准备向北发展。这时，广东陈济棠所属粤军频频向苏区进犯，在我中央苏区南大门上构成了很大威胁。为了巩固中央苏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向北发展，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回师赣南，狠狠打击粤敌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军团做为东路军的先头部队从龙岩出发。这时南方的天气已是烈日炎炎，行军很是艰苦，但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昂。走到半路，由于一军团四军军长王良同志不幸牺牲，军委决定调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去任四军军长。

六月底，五军团到达芥子圩，这时我东路军番号取消，重新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一军团行动。当时的敌情是这样的，粤军共十二个团，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庾、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地，在广东南雄附近有六个团。另外，在

赣州以北还有蒋介石的五个师，湘南有何健的两个师。我们一、五军团的任务是，由信丰进军南雄，在敌人的屁股后面造成威胁，迫使敌人回援。这样，我们在南雄一带敌人的前面截着打，三军团追着敌人后面打，一、三、五军团及十二军、独三师、独六师等部队协同配合，给这股粤敌以致命的打击。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自部署指挥下，我五军团在水口地区打了一个恶仗，就是著名的水口战役。

七月七日，粤军张枚新第四师到达乌迳。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出击，消灭张部于乌迳、新田一线。我们立即部署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三军迂回左翼包抄。八日晨得知敌于昨夜十二时许向水口逃窜。我们当即命令三军、十三军迅速改变任务，由三军追击敌人，十三军取捷径奔向水口，插到敌人前面截击退路。下午一时，先头部队三十八师已抵水口以东的翦过村，隔河与敌人打响。三时，三军也赶到该村东北端森林内。我们命令三军立即从十三军左翼突击，展开于翦过村东南地区，从右侧背后发起攻击。下午四时左右，敌人两个团溃逃，我乘胜追击，过了浈水，直追至离水口约五里的高地，已是晚上七时左右了。当夜我军撤回，主力靠拢宿营。

七月九日晨，接到军委消灭水口之敌的命令。我军立即发动攻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展开激烈的拚杀。十三军仍担任正面攻击，三军从左翼包抄，迂回到敌后与敌两个团相遇，激战数小时。中午，敌人援兵赶到，以九个团

的优势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预备队已使用尽，部队伤亡很大。三军八师的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部队几乎失去指挥。九师伤亡亦大。军长、政委、参谋长均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董振堂把外衣脱掉，身穿一件白衬衣，在阵地上身先士卒与敌人白刃格斗。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直到下午四时，敌人的进攻才渐渐弱下来。这时我独三师、独六师的援兵赶到，看到我们阵地的壮烈场面，未等命令即进入阵地与我军一起参加战斗。直到晚上七时，才打退敌人的进攻。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我们转移阵地露营。听水口方向的枪声一夜未断。

十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了。毛主席来到我们指挥所，聂荣臻和林彪也来了。毛主席听了我和董振堂的汇报，又亲自观察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当即向林、聂和我们部署了战斗任务。决定一军团使用于三军方面，十二军使用于十三军方面，命令我们马上出击，坚决消灭敌人。林、聂接受任务后便赶去部署部队。待增援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击。此时虽然陈济棠也调来了八个团增援。但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溃退了。我军乘胜追击。我跟着部队冲上去，发现毛主席也跟着冲上来了。我连忙停下劝阻。

我说现在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你不要追了，我们随部队追击就行了。毛主席不答应，一定要追。这样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他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对我们和广大指挥员是极大的鼓舞。

水口战役，我军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这次血战，共击溃敌人二十个团。粤敌经过此次惨败，全部退出了赣南，较长时间未敢再犯，使我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到巩固，取得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从整个战役的指挥上来说，毛主席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做了总结，说水口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从当时部队调动的情况看，本意是想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没有能集中起来。五军团在水口和敌人对峙了两、三天以后，一军团、十二军才赶到。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了。由于敌我兵力相当，虽然击溃了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但从作战的情况看，五军团的指战员们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水口战役三、四天的时间内，天上滴雨未下，烈日当头。有时送不上水和饭，战士们渴了喝稻田的水，饿了嚼口生米，夜晚就露宿在阵地上。由于实在太因乏，倒地就睡，醒来时才知道是与敌人的尸体躺在一起。战争如此残酷，五军团没有临阵逃脱的，表现十分

英勇。据战后统计，在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九百多人。事实雄辩地证明五军团起义过来后，经过教育改编，经过赣州、漳州特别是水口战役的考验，这支部队的思想是稳定的，作战是英勇顽强的，已经成长为一支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红色劲旅。

水口战役以后，部队开始向北发展。八月，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五军团的三军又编回了一军团，十四、十五军又编回了五军团。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乐安战役是一军团担任的主攻，三军团在乐安城东北警戒，我五军团在城南做预备队。八月十七日将城攻下，消灭敌孙连仲二十七师八十旅共三千余人。接着，又发起宜黄战役。连打两个胜仗，部队得以顺利地向北发展。不久，又发起了建黎泰战役，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与闽北苏区连成了一片。宁都起义一周年时，军委在黎川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朱德、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颁发了勋章。中央临时政府向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慰电，表彰五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这次会后，我就离开了五军团，就任新组建的建黎泰警备区的司令员兼政委。

以后，红五军团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批批的干部成长起来，至今还在党和军队中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同志有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张永勋、谷广善、李雪山、刘向山、蒋耀德等。在革命斗争中，赵博生、董振堂等一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地战斗、前进。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毛主席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红五军团以她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